

黃季陸 撰

人類的前途與世界新道德標準之樹立

——第二次中日戰爭的追憶——

國史館重印本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

國史館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人類的前途與世界新道德標準之樹立

黃季陸

——第二次中日戰爭的追憶——

蔣緯國將軍於民國五十九年，奉 總統蔣先生面命，撰寫國民革命戰史，以抗日禦侮之部爲優先，歷時六載藏事。本書內容，純以客觀研究立場，對於中日第二次戰爭有關兩國國家戰略、大戰略及野戰戰略等作深入之檢討，而以武力戰爲全書的重心。對於戰爭指導與戰略指導之史實、戰爭發生之原因，以及決定勝敗之關鍵諸方面，均作精密之論述與坦誠之檢討；在資料的蒐集與徵信上，下了一番廣大而深入的功夫；在研究方法上，更是條理分明，持論嚴謹，誠爲一精心之作。就治現代史的觀點而言，本書不僅是研究現代史的一項重大貢獻，即在我們過去的敵方日本，本書也可作爲一項重要的參證。

人類的前途與世界新道德標準之樹立

我是親身經歷過第二次中日戰爭的一人，在戰爭之前亦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激烈分子之一，但我却不是軍事學家，我所能講的只能就我對於此次戰爭的若干體認提供出我的一些意見，而對於這一次戰爭敵我兩方作戰的得失經過，在本書已言之甚詳而深入，不容我多所置議了。不過由於我獲得先讀此書的機會，書中所提供豐富的資料與論斷，卻給了我不少對於戰前戰後諸多的體認，提供了很多具體的論證。

一、中日間的宿怨和仇恨

造成戰爭的因素很多，而促成戰爭爆發原因之一，往往為國與國間、民族與民族間所存在的宿怨與仇恨，結成了相互敵視的感情，一遇衝擊，便演成戰爭的災難，而不可收拾。當民國七、八（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間，我在日本留學時，曾聽到許多日本的朋友和學人談到說：中日兩國有同文同種的關係，而中國在日本留學生的人數遠較歐美各國為多，為何中國留學歐美的學生，對所在國家都有好感，而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大多仇恨反對日本呢？我為了解答這一問題曾費了許多思考，所得的結論有二：一是我自己親身體認感受的仇日思想的最早刺激；一是國父孫先生與日本友人的一段談話。

以往赴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大都居住在東京的神田區，此地離日本的皇宮很近。在神田的鄰近有一高地名九段公園，公園中有一日本的「靖國神社」，亦即是中國所說的忠烈祠。祠中供有為日本國家犧牲、効忠的烈士神位。遊覽這個地方的人，當然以一見此一神社為主要的目標，在日本人這是一種追懷先烈、激發愛國思想的教育，在我初次遊覽此一神社的結果和我所受的刺激，便種下了我加深仇視日本的思想來源。因為在神社大門的兩旁，陳列了許多破爛而不雅觀的兵艦煙囪，在我當時遠遠見到這一情況時，我以為神社應當莊嚴、肅穆、壯觀，為何要做得如此醜惡呢？待我走近一看，原來這些破爛兵船煙囪，是甲午（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第一次中日戰爭，日本在黃海擊沉的中國海軍兵艦的殘餘，日本人把它用來作戰利品，以顯示日本國家的榮耀！社中陳列的大部都是日本戰勝中國所俘獲的各種武器。我當時還是一個未滿廿歲的青年，也許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這是他們國家的榮耀，在我的感受呢？則是一種無比的國家大恥辱！如果要追溯我仇日思想的來源，這便是一項根深蒂固、支配我半世反

日意志的鑄造者。看起來這是一件小事，但我們從這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日本這個民族是如何的氣小易盈，得意忘形，而種下了後來第二次中日戰爭的禍根。中國人反日仇日心理的形成，從這一小事便可見微知著加以說明了。

這一給予中國人無限恥辱的痕跡，可能在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東京大地震以後才被自然燬掉，在精神上也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之後才被抹去。我很奇怪的，自從我民國八年（一九一九）離開日本之後，凡我所接觸過的早期曾在日本留學的人，卻很少提及過這件事，由於健忘呢？還是由於傷痛在心而不便告人呢？

現在我要略述 國父孫先生對於中國人仇日思想的看法。當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日本政府提出廿一條件，脅迫袁世凱承認時， 國父正亡命在日本，對此事反對甚烈。他住在頭山滿先生的家裏，與寺尾博士為鄰。有一天，寺尾博士約集若干學者，請 國父演講，並提出一個問題 國父說：「我們有一個極懷疑的問題，就是日本固然凌侮了中國，侵佔了中國的權利，但是歐美各國也同樣凌侮中國，侵佔中國的權利，何以中國人恨惡日本，遠較歐美為甚？先生能否解釋其故？」 國父對此問題的答覆是：「中日兩國同文同種，誼如手足，中國如兄，日本如弟，在種種方面，本當提携協助，至中國之於歐美，僅泛泛之友人而已。泛泛之友人，予我以凌辱，本已難堪，而為弟的日本，不特不能同舟共濟，反而和外人一樣的凌辱乃兄，並且凌辱的手段較之外人還利害，請問做乃兄的在情感上是恨友人多？還是恨乃弟多？」 國父這段話可說是既淺近又透闢，因此我認為今後在增進中日關係上面兩國國民都必須深切體會這個道理。當然，尤其是日本方面，更必須明白中國過去仇恨日本的原因，日本本身是應負很大的責任的。在八年血戰之後，中國政府即宣佈對日寬大的政策，就是根據 國父所指示的原則，這也是日本國民所宜反省的。

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遠在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七月廿九日，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在台北成立時，我曾經在大會中，以內政部長身份出席致辭

人類的前途與世界新道德標準之樹立

，我在致辭中特別闡述 國父孫中山先生關於中日親善之遺教。我說：中國有句成語叫做「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日兩國今後要建立永久穩固的關係，我們切不可不把過去兩國關係所以惡化根由加以檢討。歷史可以告訴我們過去是如何的經過，同時也可以告訴我們今後應如何的努力，才不會造成歷史的重演。主張中日兩國必須親善合作，在中國最早有我們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有桂太郎、犬養木堂諸先生，在他們幾位先知竭其畢生精力以致力於中日合作親善，終不能免於以後兩國之敵視相殘者，實由於幾個重要原因所造成。這些因素不去除，仍然是今後中日兩國關係上的重大障礙。

第一、中國與近代世界大接觸，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的鴉片戰爭是一個大的關鍵。同樣的事件發生於日本則遠在十幾年之後。咸豐三年（一八五三）美國柏利（Perry）海軍提督率領軍艦打破日本之閉關自守，迫使日本進入於近代的世界。日本近代的開國雖然後於鴉片戰爭十幾年，但是日本近代的進步却早於中國四、五十年。中國是一直到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義和團之役以後，才被迫失去其固有的信心，而接受近代世界的教訓的。由於我們覺醒的太晚，日本便一直猛勇前進，在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先擊敗了中國，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又戰勝了俄國，於是日本便成了世界第一強國之一。日本在戰勝俄國之前，亞洲幾無一個強盛的國家，日本的興起，給了亞洲各民族以很大的興奮。中國的革命受到日本興起的鼓勵，也是無限的大。中國同盟會創辦的「民報」揭櫫的六大主張，其中便有一項是「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由此我們便可以明白中國的革命所寄予日本的興起的希望是如何的親切而重要了。 國父孫先生曾說：「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所以中國革命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又說：「可惜日本維新之後，得到了強盛，反忘却了中國革命之失敗，所以中日感情日趨疏遠。」

我爲甚麼要引出上面一些中日兩國歷史的事實呢？第一是在說明日本近代的開國雖遲於中國十幾年，却是日本的進步反早於中國四、五十年。日本所以進步的原因是由於日本畢竟國家小，她所受歷史文化惰性的束縛的地方不像我們中國那樣積重難返，不易適應。當日本受到柏利海軍提督率領美國艦隊進入日本的時候，日本尚停留在封建幕府的時代，可是日本人民知道大勢所趨，無可逃避，唯一自救的途徑，便是歸還大政於朝廷，以求國家的統一。開國維新，以適應世界新局勢迫切的需要。這是日本成

功的一個奇蹟，而中國的失敗，則又由於恰恰與日本此一情形相反的原故。

最應引爲可歎的一件事，莫如在鴉片戰爭之後，在中國即有魏源其人，著有「海國圖誌」一書，介紹西洋勢力入侵之真像，以喚起國人，面對新局，「師夷人之長技以制夷」，而奮起圖強，以挽救中國危機。但却未爲朝野所注意，而急起直追。據日本史家的意見，此書在中國所發生的影響，遠不如在日本之大。日本之維新進步與對西方之了解，得力於此書者甚大。鴉片戰爭爲中國閉關時代，帶來了災難，而在十三年以後，日本閉關局面，爲美國海軍提督柏利所打破之時，日本因鑑於中國鴉片戰爭，戰敗所蒙受的慘痛教訓，對於此一新興西方勢力的來侵，加強了認識，力求避免重蹈中國之覆轍。於是改取忍辱負重政策，暫作城下之盟，以渡過危機，力謀進取，而奠定了日本建設近代國家之基礎。中國之災難，竟成了日本興起之助力，實屬一項歷史奇蹟！

在我個人看來，日本在近代的歷史中有兩個最大的難關，而日本人民都輕易的把他渡過，國家得免於滅亡：一個是上述的日本由近代的明治維新以至富強；一個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人民能於戰敗之餘低首下氣，反省自新，於戰敗不久之後，竟能恢復主權，重入於世界強國之列。日本民族在這樣艱危的局面所表現的精神，是說明日本人民是一個經得起風浪患難的民族，這真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可是我們從歷史的研究，所引爲隱憂的是：一個經得起風浪患難的民族，不一定便是富強不驕，得意不忘形的民族，而日本過去的歷史所告訴給我們的，就是她在富強之後，便種下了錯誤失敗的種子。譬如說過去日本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戰敗俄國取得富強之後，本可以與中國提携共謀亞洲民族的共存共榮，而日本不此之圖，不但作亞洲民族的干城，反而作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亞洲的鷹犬，對朝鮮的吞併便是一個不智之舉。關於這個問題，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國父訪問日本即曾對其時的日本首相桂太郎說：「就大亞細亞主義之精神言，應以真正平等友善爲原則。日俄戰前，中國同情於日本，日俄戰後，中國反而對日本不表同情，其原因在日本乘戰勝之勢舉朝鮮而有之，朝鮮果何補於日本？然日本之佔有朝鮮，影響於今後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種措施，爲明智者所不爲。」當時桂太郎聽到這段話，非常感動，他並對國父說：「我此次受命組閣，爲時僅三月

，假使我能主政一年，必力反所爲，有以報命。」由此足見他們兩位對中日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可惜桂太郎未能實現他的政策，不久便齎志以歿。以後的執政者也未能體會他的遠見，竟由吞滅朝鮮，進而大舉侵略中國，不僅不能增進中日的友善，而且走上相反的道路上去，這是日本的不幸，也是中國與亞洲各民族的不幸。我們要建立今後兩國永久穩固的友好關係，對於過去的事實與先知們的遠見，是值得中日兩個民族警惕與反省的。

第二、中日兩民族在文化上是同文同種，在地理上是唇齒相依，正如國父所說：「無中國即無日本，無日本亦無中國。」也就是合則兩全，分則兩傷的道理。假如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日本不能戰勝俄國，不僅亞洲沒有一個完全自主的國家，而中國也將不免於瓜分亡國。自九一八以至盧溝橋事變，中日兩國戰爭發生之後，其結果造成赤俄與共黨亞洲的興起，日本固然戰敗了，而中國大陸也不免於淪陷，造成今日整個亞洲與世界和平之威脅。猶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內，日本向中國提出廿一條件以壓制中國，兩國關係由此日趨惡化。中國一部份人士有主張聯美以制日者。國父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在中國存亡問題一書中，特以中美日三國利害關係，對此說特別加以痛斥。其言曰：「引美以排日誤者，非美不勝日之謂也，使美國戰而勝日，於中國無所補，而於美國與日本皆有所損，日本而敗，大者破國，小者地削，其損無俟言矣。爲美國者，果有利乎？傾國家之財力以張軍備，即能勝日本，元氣已傷……今日歐洲戰局雖難預料，而和議定後爲最強者非德即俄……此二國者……果能任美國於中國取得特殊之利益乎？必不能也。美既勝日本之後，利害即與德俄衝突，因之更須與一最強國戰……然則美國之倒日本，適自召強敵之接觸，終於兩敗俱傷，非日本之利，亦非美國之利，尤非中國之利，明矣！」國父所言，雖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勝負未分的時候，然此一不幸的事實，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果如其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日本固然失敗了，而蘇俄也便興起於亞洲。於是亞洲與世界之局勢便正如他所說陷於極大之悲境。在此一局勢之下，今日日本之再度興起，實爲中國之利，也正如日俄戰爭日本之戰勝俄國，而中國得免於瓜分一樣。因此中國對於日本，在反共抗俄的目標下，正希望日本之強大，而並不希望日本之衰落，是很明顯的。不僅現在如此，過去也是如此。

如果要制止俄國在亞洲的發展，不僅需要一個強大的日本，同時更需要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中國強大了，日本便也可免於

受俄國強大的威脅。我們試一檢討亞洲問題演變至今日幾不可收拾的境地，不能不說是由日本過去的錯誤所造成。即是：日本過去始終不願中國之統一與強大，故其對中國必欲遂其侵略而吞併之野心，於是蘇俄與中共便乘隙控制了今日中國大陸。往事已經過去了，未來的如何補救，這是今後日本政治家和日本的人民應當反省的，也是要建立中日兩國今後友好關係上重要的一個環節。

三、日本不願中國之強大與革命之成功

造成中日關係惡化，除了上述日本民族無遠識，心胸狹窄，氣小易盈，得意忘形諸種原因之外，還有一項對中國牢不可破的觀念，那便是不願中國之統一強大與中國革命之成功。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有幾件史實對此可以作一說明：

一、當中國辛亥武昌起義，全國響應之際，其時日本政府即有出兵東北，扶助滿清，以阻撓中國革命成功之企圖，其原因則為不願中國在亞洲建立一民主共和國，因而影響到日本萬世一系之天皇制度。

二、當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十六年平定東南，奠都南京，中國將統一全國之際，日本便第一次出兵山東，企圖阻撓中國之統一。其後因中國本身發生清共絕俄運動及內部之分裂，蔣先生中正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下野，日本便撤兵回國，暫時中止其對中國之野心企圖。這一歷史事跡，不僅說明了日本不願中國之統一強大，而且說明了日本更不願中國產生一強固之領導中心，如蔣先生中正者，以導致中國之統一富強。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日本曾多次向中國求和，而又宣稱不以國民政府為對象，亦即是不以掌握實際權力可以決定和戰大計的蔣先生為對象，皆由此種心理所造成。

當民國十六年蔣先生中正於下野後赴日本訪問期間，於是年十月五日曾與田中義一首相晤談，以圖日本之改善其對華政策。據隨同訪問的張岳軍先生記述其談話經過，則知日本對中國北伐統一之態度已成爲日本一牢不可破的阻撓政策。張先生的回憶說：在晤談時蔣先生向田中說明了國民革命軍的實況。並提出三點說明：

（一）中日必須精誠合作，以真平等的基點，方能共存共榮；此則胥視日本以後對華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敗軍閥為對象，應

以求自由平等之國民黨爲對象。換言之，不可在中國製造奴隸，應擇有志愛國者爲朋友。必如此，中日才能真正攜手合作。

(二)中國國民革命軍，以後必將繼續北伐，完成其革命統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

(三)日本對中國之政策，必須放棄武力，而以經濟爲合作之張本。

蔣先生並表示，這次訪問日本對於中日兩國的合作，甚願與田中交換意見，並希望獲得結果，他請田中「明教」。

田中問：閣下何不以南京爲目標，統一長江爲宗旨，何以急急北伐？（「目標」二字或爲「根據」之誤，因其時國民革命軍已奠都南京了。）

蔣先生回答：中國革命志在統一全國，太平天國的覆轍，豈可再蹈？故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而且中國如不能統一，則東亞不能安定，這固然是中國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

張岳軍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蔣先生的談話辭意很坦誠，當蔣先生提到「中國革命志在統一全國」的時候，田中的臉色就變了。

田中對北伐問題，先表示：「從中國內部分裂狀況看來，革命的實行非常困難。」接著他向蔣先生提議：「爲了先要使長江以南的基礎穩固下來，似可不必急於北伐，而專心於南方統一，如何？」

蔣先生婉轉的答覆：「對於不宜立即北伐，以及等南方鞏固之後，再行北伐的高見，固有同感。」但是同時表示：「如果不繼續北伐，則南方反而會有發生禍亂之虞。」

蔣先生在和田中會談後，更看清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和陰謀，感慨萬端。他在日記中特別寫下：

「綜核今天與田中談話之結果，可斷言其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止中國之統一，更灼然可見矣！」

三、當蔣先生中正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七）一月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率師北伐，直抵濟南，於是日本便第二次出師山東，以阻止國民革命軍之前進，因而便發生了五月三日的衝突，即世所謂的「五三濟南慘案」。如果不因蔣總司令之忍辱

負重，明智的決策，一面防制事變之擴大，一面仍繼續繞道北伐，則中國之統一，必爲日本之陰謀所阻，而陷於癱瘓了。

四、由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之北伐統一成功，中國正趨向於統一建設之際，於是日本便不得不施其最後之伎倆，於民國廿年在東北發動舉世震驚的「九一八」侵華事件，以迄於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因盧溝橋事件，促成中國對日之全面抗戰。中國經過了八年艱苦的奮鬥，終於在民國卅四年迫使日本投降。

我在上面已經把我個人對日本的體認與感受所結成的仇日反日心理加以追述，而這一仇日反日的心理，如果不是由於日本民族缺少遠見，心胸狹窄，氣小易盈，得意忘形，迫使中國不得不爲生存而戰，我想中日第二次戰爭，並不是不能避免的，即使發生，如果日本有了能見其大的政治家，保持政治支配軍事的國策，在戰爭發動之後又能懸崖勒馬，也不會潰決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造成日本最後的失敗，世界和亞洲的形勢亦不會如今日之紛亂了。

四、日本罔顧國際情勢認友爲敵

當民國六、七年（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之交，我尙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我曾讀過一位日本軍事家佐藤中將寫的一本書，名「日米若シ戰ハバ？」（日美如作戰的話？），亦即是一本著名研究日本美國戰爭的書。內容是預測日本如果與美國發生戰爭時的情形。他在這本書裏講到海軍問題，他說日本人是從小受軍事訓練的，無論精神上技術上都比美國強得多，假定萬一與美國發生戰爭，美國把所有的艦隊全部開到太平洋來，日本要殲滅他們，可能不可能呢？他認爲這是可能的，但是有一點日本是沒有法子克服的。以美國的經濟、資源、工業技術和造艦能力而論，祇需半年之內，便可以把所有被殲滅了的艦隊從新建造起來，繼續作戰；可是在這點上日本是否能做得到呢？並非絕對的不可能，可是起碼得要四年，換句話說，假定日本的艦隊被消滅了，以她造艦的能力和美國的相較是一與八的比例，計算起來，非四年不行，這是說不是日本不能擴充軍備，而是經濟上、資源上、工業技術上，以及造船能力上，她沒有和人家相等的能力。

佐藤中將這本書出版在民國六年（一九一七），距中日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廿年，到了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日本襲擊珍

珠港事件爆發的前夕，日與美的海軍造船能力已由一與八之比變成一與三之比，然而在飛機生產力方面則美國為日本的十倍。其相差的懸殊，日本實居於劣勢，尤其飛機在戰爭上的重要，已把海軍的力量降為次要的地位了。日本不乏明智之士，如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與海相及川等，在日美戰前均認為日本與美國作戰，實無勝利把握，其最後竟出於與美一戰者，實由於日本侵略中國戰力消耗過多，已超出其國防實力對付美國的公算，迫使其不得不鋌而走險，為孤注之一擲。卒致造成日本之失敗，中國之最後勝利。關於此點，容後將詳論之。

從「日美如作戰的話？」這一書中，使我了解一種日本國力的具體知識，那便是說日本在亞洲雖然是一個超強的國家，但在亞洲具有重大利益的美國，更是比日本國力為強大。我由於厭惡日本，乃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轉赴美國留學。在我留美期間，適值美國哈定總統（Harding 一八六五—一九二三），爲了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巴黎和會對於解決中國問題缺失有所補救，及對於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突起驚人的國力膨脹有所平衡，乃於民國十年（一九一一）召集在遠東有利益關係各國舉行太平洋會議於華盛頓，通過了九國公約，對於亞洲問題有了一項新的調整。九國公約第一條的規定說：

「除中國外，締約各國協定：（一）尊重中國之主權及獨立，暨領土行政之完整。（二）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三）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行動。」

從九國公約締結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遠東與中國獨霸之形勢，得加以制止；而中國所處之地位，已恢復到第一次大戰前各國在中國角逐之「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的一種均勢。一直到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日本侵華，在中國東北爆發九一八事變後，此一均勢才被破壞。

九國公約的締結，固然把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獨霸遠東，置中國於控制之下的局面有所改善；但其最大的缺點，則爲在遠東具有最大地緣關係的俄國，却因自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發生革命，被世界各國所敵視，正陷於內外交迫，紛亂迭起的困境之中，而未得成爲簽約各國之一員。迄至蘇俄內部鞏固之後，乃移其注意力於遠東方面之擴張發展，於是遠東的形勢便爲之大變。

。我們要談第二次中日戰爭，這一新興的蘇俄，勿論在戰前或戰後，她的陰謀與影響力，無疑的成爲一切戰亂的根由，這是萬不可加以忽視的關鍵。

當蘇俄勢力興起之際，日本與德國意大利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締結了防共協定，迄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月德蘇戰爭爆發，日本若能對中國讓步，移轉其當時侵略中國之軍力配合德國以夾擊蘇俄，則世界之局勢又何至演變至於蘇俄之坐大，及其對今日世界之威脅！

華盛頓會議更重要的一項決定，則爲對於美、英、日本三國的海軍實力，作了一項五、五、三的比例決定。在主力艦方面英美兩國爲五，日本僅爲三。日本對中國來講，固然是強國，但在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尚有英美各國，而與日本利益相衝突。這一事實，使我在求學時代，便深植了一種對日報仇雪恥、打擊日本有利的戰略思想。第一是了解了日本的國防政策，本質是：陸空軍主力是在對付蘇聯，海空軍的主力是在對付英美，中國只是他侵略的對象，而不是他國防主要目標。第二是了解太平洋會議後已顯露出英美各國是在防制日本在亞洲的獨霸，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國，我們大可在華盛頓會議後的遠東局勢加以運用，以對付日本，而不會陷於孤立無援。中日第二次戰爭引發爲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日本失敗的根由。

五、文化的潛力與地大物博的民族遺產

中日第二次戰爭，我們是以弱敵強，所以終於獲致最後勝利，有幾項基本的因素，值得提出來探討一番：

第一、八年艱苦抗戰是我民族文化潛力的最大發揮，而這一民族文化潛力的發揮，是國父領導的國民革命，經過推翻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艱苦奮鬥，喚起了順應世界潮流的民族自覺。在國父逝世後，總統蔣先生中正繼承了國父的志業，完成了東征、北伐、清黨、統一全國的偉業。從艱苦中獲得的經驗與教訓，在日本侵略壓迫之下，奮起而發揮其睿智的決策，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領導全民，發揮了民族文化最大的潛力所造成。

一個基於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並不決定於武力的強弱上作對比，而是決定於民族文化所具備的精神潛力的有效運用。因爲

文化是一個國家積累的資財，是一個民族生存無可比擬的戰力。我且引用戰前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一段談話作參證。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當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Abyssinia）的時候，國聯在英國暗示下認為這是個侵略的戰爭，便決議予以經濟制裁。中國是國聯的會員國，當然跟著各國要去制裁意大利了。可是在這中間却發生了一個問題，因為當時我們的飛機和國防上的種種需要，不少是仰給意大利的，因此對意大利的關係，也較密切。在墨索里尼把阿比西尼亞侵佔後，立刻就要求世界各國予以承認。當時意大利外交當局便說，中國如果真正與意大利友好，便應該首先承認阿比西尼亞的歸併。這確是一個難題——以中國的立場來講，如果我們承認了意大利的吞併阿比西尼亞，就等於是承認日本的佔領我國東北同樣是正當的行為，況且中國又是國聯會員國，所以各方面看來，勢必不能承認。儘管那時中、意關係很好，可是如果承認了這件事，中國本身將何以自解？

我們駐意的外交官，當時爲了這事便去見墨索里尼，把我們的苦衷向他說了，並且告訴他，我們只能盡可能的幫助。因為我們在那時國防上的許多設備，還須靠意國幫忙，因此不能不委婉敷衍一番。墨索里尼聽了，對我們外交官說：「你真是笑話！怎麼會想到中國被日本吞滅？你們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怎麼如此自暴自棄？意大利之所以征服阿比西尼亞，因為阿比西尼亞是一個野蠻的國家，一切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種種，還是以前奴隸制度，所以我們要消滅他，而以我們這樣優秀的民族去傳播文化，換句話說，意阿之戰，就是文明國家征服一個野蠻民族的戰爭。而中國與日本不同，日本的一切文化，都是從中國方面學去的，中國是個古文明的國家，日本等於是個剛出校門的小學生，因此日本打中國，簡直是數典忘祖，決不能和意大利的打阿比西尼亞相提並論。」

墨索里尼的話，是研究國防問題很重要的參考資料。如果以槍炮武力來計算，日本也許可以打敗我們，但是征服一個國家，不是單靠武力，武力之外，還得靠文化的力量。譬如：在抗戰期中日本在其佔據的區域內，肆意姦淫燒殺，殘酷橫暴，極人間之慘事，但無論如何，總無法使淪陷區內我們的同胞馴服。本來從前日人的軍紀，在世界上很有聲譽的，爲什麼後來到了中國的領土，軍紀蕩然，不堪聞問呢？這恐怕不是日本軍隊的素質改變了，而是我們誓死抵抗，不爲暴力所屈服的緣故。

舉一個例來說：在庚子那年，八國聯軍攻陷北平的時候，軍紀壞的軍隊固然很多，但軍紀好的軍隊，在許多國家中，也未始沒有，然而最守軍紀的要算是日本軍隊，真可以說是秋毫無犯。不但如此，他們還阻止英法各國軍隊的胡亂行爲；所以八國聯軍之役，至今在北方的傳說中，還可以聽到「東洋人到底不同」的好評。因此我們知道以前日本的軍紀確是很好的，那末同樣是戰爭，爲什麼又變得這樣壞呢？這是因爲當庚子之役時日本人的心理，還有所謂同文同種的觀念，帶隊的官長，也能約束士兵，而歐洲各國的軍隊，觀念畢竟不同，所以比較起來，日本的軍紀自是很好了。又抗戰時日本的軍紀所以這樣的原因，是因爲日軍所到之處，中國的老百姓，拼命抵抗，組織游擊隊來報復，這種仇視反抗的心理，就是說明征服野蠻國家與征服文明國家的方式迥然不同。野蠻的國家，可以用武力去征服，好比一個不知人事的小孩子，你打了他以後，從此便不敢胡鬧，服服貼貼的順從你。而一個文明國家就像是一個成年人，他有他的歷史文化地位的自尊和見解。要轉變他的心理決非用武力所能奏效的。我想任何一個中國人，誰都不會承認日本比我們文明，即使對方再厲害到什麼田地，總沒有一個人會佩服贊許的。正如一個有身份的人，家世雖然衰落了，可是要讓一個暴富的無賴，有錢帶勢的欺侮他，總是不甘心的。所以日本儘管佔了我們很多的地方，軍事上得到勝利，但並不能統制我們。何以呢？這就是因爲我們有了民族悠久文化的歷史。我在抗戰時看到很多傷兵或是從前方退下來的士兵，他們儘管受了傷，打了敗仗，可是你問他日本怎麼樣了？他們總不服氣的說：「小鬼不行，只靠飛機大炮，一見我們的軍隊接近了他們，便馬上退下去了。」其實，近代作戰手段最大特點，就是在你看不見他的時候，把你癱瘓摧毀，然而我們的士兵却並不因此而喪失其戰志！

戰爭本是很神秘的東西。任何國家，決不能以武力來征服一個文明的國家，如果沒有使人人心悅誠服的高度文化，一切都是枉然。縱然佔領了人家很多的領土，而這被侵略的國家隨時都可以復興起來，把你趕走的。像這類的歷史，在中國不知演變了多少次，如宋之於元：蒙古人當時固然以軍事的力量，征服了宋，但蒙古人一進了中國，一切生活習慣風俗種種，漸漸的都改用了中國的生活方式，因而結果被中國同化。滿清在中國也像蒙古一樣，雖然他們比蒙古聰明得多，用了種種的方法，想永久統治中國，在中國佔據的年代也比蒙古人多了三倍多，可是結果還是同化于中國，所以辛亥革命一起，滿清政府便立刻就崩潰，亞洲第

一個民主共和國因以誕生，這都是證明中國文化力量最偉大的地方。

講到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如果單靠軍事的力量而忽略了文化的力量來估計中國，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結果往往適得其反。這在歷史中可以找到很多的證明。在幾百年前想單靠武力來征服一個有文化的國家，尚且不成功，何況現在廿世紀，想要完全以武力征服一個有悠久歷史和高深文化的國家，更是不可能了。所謂經濟國防，及其他種種的國防，都在其次，惟有文化才是一個國家最大的國防。這文化的國防，才是一個不可征服的偉大力量。

總統蔣先生曾有句名言，他說：「我們必須警悟一個民族，其軍事的失敗，尚可以復興，而其文化的淪亡就要萬劫不復了。」又說：「我們在革命過程中，經過多少次的狂潮，終能恢復國土，在強權壓迫之下，仍能爭回自由，這就是我們文化的結晶——三民主義，領導革命最顯著的功效。」

第二、除了上述我們的先人遺留給我們一項民族歷史文化的遺產，發揮而為無可比擬的抗日戰力之外，我們的祖先更為我們遺留了一項「地大物博，人口佔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優秀民族。」不僅是「廣土」，而且是「衆民」，佔有最大地利的一項遺產。因此，我們才能在強大的日本武力進攻之下，於沿江沿海各省失陷之後，仍能繼續抵抗，以空間換取了時間，獲得了最後勝利。總統蔣先生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八月十一日在峨嵋軍官訓練團，表示他準備抗日的決心和信心，曾經有下列的提示：

「……川滇黔三省的軍人，格外要明白與體行這個道理，來發揚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光榮，以川滇黔為中華民國復興的根據地，大家一心一德，為國犧牲，使我們中華民國，永遠安固昌隆，巍然屹立於世界！我敢說：我們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的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復興國家，完成革命……」

國父孫先生在孫文學說第五章中曾有同樣之提示：

「以我四萬萬優秀文明之民族，據有四百二十七萬方哩之土地（較之日本所有土地不過十四萬餘方哩，今有土地亦不過二十六萬方哩耳。）為世界獨一廣大之富源，正所謂以有為之人，據有為之地，而遇有為之時者也。倘使我國之後知後覺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迷信，而奮起以倣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

誠有如反掌之易也。」

國父孫先生上項提示雖遠在抗戰發生之前二十多年，並不是針對對日抗戰而言，但其對中華民族富有之文化遺產與地理及物質的遺產，已爲我們指示出民族前途光明的遠景了。

當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武漢陷落，我經過湖南、廣西、貴州回到抗戰後方我的四川故鄉，當我經過貴陽時，美國大使詹森（Johnson）漢巧也經過貴陽，同時英國大使卡爾（Carr）因轉道雲南，也正在貴陽，於是我就很注意他們的行蹤和言論。本來我對於抗戰的意志非常堅強，對於各種有關問題亦作了深長的考慮，但是對於中國是否能保全一個完整的地方，以作長期的根據地，這個問題，却很把握不定。但是到了貴陽以後我才恍然大悟了，因爲看到那些地方是崇山峻嶺，地勢險阻，日本無論如何不能把軍事力量伸展進來，而我們正可利用這種地方以作抗戰建國、復興民族的根據地。在我個人觀察，認爲未曾到過四川、貴州的英國和美國當局，他們對於當時中國的抗戰，在先的確有所懷疑，自從他們走過了川滇黔那些地方以後，才發現中國的真正偉大，才了解中國抗戰之真有把握。從前李太白曾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我由廣西到貴州的途中就發現廣西這段路還比較容易走，到了貴州境界，道路更是崎嶇，十分險阻，大概李太白沒有到過貴州，所以祇知蜀道之難，不知貴州道路之難，那才真是難於上青天。在川、滇、黔這些天然的屏障地區，日本不要說無力深入，即使兵力充分，也是難於得逞的。我想英美兩國的大使回到本國，一定會把他們經過中國西部地形很詳盡的向他們政府報告，說明這些地方之易守難攻，中國是可以繼續抗戰下去的。所以後來英美的態度便有所轉變，漸漸借款支援中國，以支持中國的抗戰，同時對日本的想法也不再估計太高，他們看見中國還能夠有力量繼續抗戰，所以對中國的態度，也就樂觀起來了。

以上是我們祖先遺留給我們爲文化遺產和地理及物質的兩項先天的遺產。這說明了我們民族不可征服的客觀條件。迷信武力是可征服中國的日本軍人，固很少考慮到這些超越武力的因素和原理，日本侵華之失敗，其錯誤也重因於此。

六、我們獲勝的基因——在鬥智而不在鬥力

在主觀條件方面，我體認檢討第二次中日大戰，我國獲得最後勝利的基因，可以歸功於以下二點：

一是日本對華侵略估計的錯誤。

二是我最高統帥 蔣先生中正在戰前戰後掌握了敵人的弱點，使日軍處處撲空，由強轉弱。他的睿智領導，堅苦卓絕與抗戰到底，認定中日戰爭問題必須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這一有遠見的正確的決策，終於擊敗日本獲得勝利。

以下先談日本侵華之估計錯誤：

在前面我已經提到，自民國十年（一九二一）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締結之後，已具體顯示出遠東之國際情勢，已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獨霸遠東，置中國於他控制之下單純的中日兩國的問題，而是戰後與遠東利益有關，各國在中國共同採取制壓日本的獨霸，以達到各國在中國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的政策。尤其重要的是，俄國自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大革命之後，國力已漸漸強大，成為在地緣上是遠東最重要的大國，這一新興的力量在九國公約締造之時，是未曾作了計算的。

因此，日本國防的本質是海空軍的主力對付英美之外，陸空軍的主力又必須以蘇聯為假想的敵人。中國只是他侵略的對象，而不是他國防政策的主要目標。日本錯把他對付英美蘇俄的實力消耗在中國，失去了對付強國的國防公算，致使政略與軍略都陷於錯誤，迫使自己鋌而走險，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發動對美襲擊珍珠港事件。於是由中日兩國的戰爭，演變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前途便不堪設想了。

我現在特別引用日本元老西園寺公望在中日戰事爆發後，對跋扈的日本少壯軍人一段談話以作說明。

西園寺在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日本「二二六事變」中，日本的少壯軍人本來要殺他的，後來總算僥倖沒有被殺。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八）日本與蘇聯在張鼓峯發生衝突時，日本的軍人急了，便去請教他。當是西園寺很幽默的對那些軍人說明了他的意見。他說：「你們這些年輕人，事先不同我商量，等到事情急了，才來找我。好今既然找到了我，就不能不坦白告訴你們：我們不能一面打中國，同時又打蘇聯，總要結束一面才行。」於是日本對蘇聯不得不忍辱讓步妥協，滿城風雨的張鼓峯事變就此告一段落，結束了日本對蘇聯的衝突，而繼續侵略中國。這是西園寺對張鼓峯事件給予日本軍人的一種指示。此外西園寺更

面斥他們輕舉妄動，說是日本在沒有同中國作戰以前，日本的國防力量是的確可以稱霸遠東，可是到了今天，在世界戰爭還未開始的時候，日本的實力，已經大不如前了。他說：「我舉個比喻給你們聽——日本的國防等於一桌很好的筵席，我們正式的客人還沒有請到，却已經給『乞丐』吃完了。」這意思是說日本要對付英美蘇聯的力量，已經錯用到中國，而今已陷入困境了。

基於以上的情形，我們對日本作戰，不是兩國軍事力量的對比，如果作對比，日本是超強，而我們則是弱國，是敵不過他的。我們致勝的把握是在打他的「零頭」，亦即是要打破日本用來對付他真正敵人的美、英和蘇俄的國防公算。就是說日本的國防是有計畫的：以海空軍對付英、美；陸空軍對付蘇聯。在軍力上的配備和資源的接濟等等，日本縱然不能有十分的把握去征服英美蘇聯，但至少日本對本身的自衛力是應該具有的。譬如拿華盛頓條約來講，外間許多人不明白英、美、日海軍數字五、五、三的比率的真相，以為日本比英美兩國各差五分之一，比英美兩國的總數就要差十分之七，表面上是好似吃虧了。其實當時日本的企圖只想把持遠東，并未想把勢力擴展到歐美去，在遠東他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應付。英美的數目字雖然多於日本，但他們的殖民地很多，海岸線也很長，不能以海軍的力量完全放在太平洋，所以日本的「三」用來侵略英美的「五」誠然不夠，而拿來保障太平洋的霸權是綽綽有餘的。同時英美當時所注重的是巨型艦，因此很嚴格的限制日本巨型艦的建造，以限制他具有威脅其他地區的力量。這個海軍協定，就在這樣情形之下成立了。

我們所謂打「零頭」，就是要打破日本的國防公算，使他海空軍不能對付英美，陸空軍不能對付蘇聯。到此情形，日本只有一條路可走：那便是知難而退。因為他的國防對象，不是中國，而是與他抗衡的其他強國，否則便只有自趨滅亡。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是完全建築在利害上的，到了利害不能相容的時候，敵友關係便會發生變化。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目標，決不能輕易因小失大，變更了自己的目標，求取一時之利。日本過去的錯誤就在把他原有對付英、美、蘇聯的計畫改變以對付中國。

檢討在我們節節對日的抗戰中，日本的力量已經漸漸消耗，他的國防公算的優勢，被我們把他的「零頭」打掉了。我們無論讀中國史或外國史，只有看到戰敗的國家向戰勝的國家求和，決沒有看到戰勝的國家反而向戰敗的國家求和的。但中國同日本的戰爭就很奇怪，當我軍放棄上海的時候，和平空氣非常濃厚，然而這空氣並非中國放出，而是日本方面的反宣傳，說中國屈服了

，可以不再打仗，實行「共同防共」了。後來日軍佔南京，和平的空氣更加厲害，甚至有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Tessmann）出來斡旋。可是我們知道這媾和的動機也不是出於德國方面，而完全是日本授意德國，由其大使陶德曼出面調解的。後來廣州淪陷，武漢失守，我們到了長沙、桂林，天天從無線電收音機中聽到日本求和的消息，然而這都是日本方面播放出來的。任何戰爭祇有打敗了的國家出來求和，日本打了勝仗，反而向我們求和，其原因就在日本用以對付中國的國防力量透支過多，等將來世界大戰一旦發生的時候，勢必無法應付英、美、蘇聯，才發出此一欲罷不能的和平呼聲。假使當時的日本政府能夠控制日本的軍閥在中國的胡作妄為，知難而退，放棄其對中國吞併的野心，和平並非是不可能的，又何至陷在中國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呢？

日本的策略總想使我們愈早屈服愈好，但是在上海我們不屈服；到了南京我們仍然不屈服；打下了廣州，以為總可以使我們接受他的條件，但是我們還是不屈服；到了武漢，以為我們必定會屈服的，那知我們仍然堅持的繼續抗戰下去。因此日本的軍略和政略一錯再錯，以至不可收拾。他想效法意大利對付阿比西尼亞的方法來對付中國，預備一下就把中國解決了。其實他不懂得這個道理，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文化極高的國家，日本的飛機大砲儘管厲害，儘管佔領我們很多的土地，中國豈是武力所能征服了的嗎？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的結束達不到政治的要求，這戰爭就算是失敗了。何況在日本的後面，還有許多國家正在等候著日本在中國的失敗，坐收漁人之利呢？從日本的國防對象是英美蘇聯這點看來，我們的政治戰略與軍事戰略，自開戰至勝利，沒有一着不是正確掌握了她此一弱點，使其愈陷愈深，不能了結。日本估計我們淞滬失陷後會屈服，但我們不屈服，于是再拿一點力量來補充，繼續侵略，從南京以至廣州、武漢，他們對和與戰都無大決心，始終都走向錯誤的道路，而不能自制。所以從軍事上看，日本在淞滬戰爭的時候，如果對和平下一個大決心，對中國讓步，或以大軍對我們分路追擊，多方進攻，也許可以把我們打得很慘，但日本計不出此，他的軍略老不跟著政略走。一個國家到了這個地步，總沒有方法好補救的。有部份人以爲武漢退出，中國就沒有辦法，彷彿只有屈辱求和，才能免於災難，像汪精衛這樣的人就是一個例子。從軍略與政略的本身來講，日本得了武漢與得了重慶並無什麼分別，因為他的目的在於趁早把戰爭結束，以應付他真正的敵人。我們的目的在國家的自由與獨立，日本

不放棄其侵略的企圖全面自中國撤退，不達目的，我們是誓不終止的。日本要速戰速決，我們便不予以速決的希望，我們的戰略構想是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消耗他的實力，使其自困，苦掙以待世界局勢之變，使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以獲得最後之勝利。因此日本儘管在軍事上不斷的進展，可是戰爭並未達到解決，由於日本在中國消耗太大，他的國防公算透支太多，以致政略與軍略計畫便大亂其步驟。

中國最後之勝利在於此，中國在此後對同盟作戰之貢獻，亦莫大於此。

七、睿智的決策——建立人類新道德的標準

總結第二次中日戰爭，在人類歷史上之影響有兩大空前之突破，亦為人類今後禍福之所繫。

第一是：中日戰爭發端於日本之侵略，中國是以弱敵強，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是自衛而不是侵略。由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啓其端，引發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的結果為人類帶來了毀滅性的原子武器使用的序幕。

第二是：由慘酷犧牲的戰爭結果，為人類帶來一項新的曙光，那就是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主席蔣先生中正即昭告世界，宣佈中國對日本之立場為「不念舊惡，以德報怨，」不出兵佔領，不索取賠償，優待遣送日本軍民二百餘萬人安全返其故國的大方針。在慘酷的戰爭之後，為人類樹立了一項和平安樂的最高道德準則。

這一最高道德的準則與歷來戰爭之本質正相違反，在以往的戰爭中，道德的原則，已認為「王道迂闊而不為」。因為一切戰爭無不在慘酷行為中擊敗對方，以達到勝利之目的。在備受戰爭摧殘創痛之後，而能發為不事報復，不念舊惡，以德報怨，對敵施行空前未有之寬大政策者，不僅為人類有史以來所罕有，更為人類面臨毀滅性原子戰爭時代之威脅，帶來了一線光明。細察此一措施，非具有高度文化素養與最大智慧的民族與領導，是不能發揮出此一對人類福禍所依的道德原則的。而睿智的決策與領導，更為執行此一道德原則的不可或少的條件。

我在本文中曾述及中日之戰，中國獲得勝利的原因之一，為中國民族文化潛力最大之發揮。民族文化潛力的發揮，是就中國

被迫而應戰，以弱國而戰勝了強大的日本而言。在另一方面，中國文化最大潛力之發揮，則無過於在對日抗戰勝利之後，所樹立之道德原則。

總統蔣先生的確是 國父志業的偉大的繼承者，他繼承 國父孫先生最大的貢獻，則是在勝利之後，對日所採取的以德報怨的寬大決策。追尋他此一決策的思想來源，則是他對 國父孫先生遺志，作了忠實而勇敢的作爲。遠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孫先生在民族主義的第六講作結論時，曾指示我們國家強弱的原因，是道德的問題。他說：

「中國能夠達到很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所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的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在民族主義的最後結論，闡明民族主義的精神時， 國父再說：「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但是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領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國學到日本，就要變成十個列強。現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過五大強國，以後德、俄恢復起來，也不過六、七個強國，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只要用一國便變成十個強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以恢復到頭一個地位。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甚麼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為中國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安南、緬甸、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

在我的記憶中，當 國父講到這裏的時候，他特別喚起大家的重視說：

「你們要注意！你們要注意！你們要注意！」一共連說了三次。

在民族主義這段的演講記錄中，對於這一段的重要的語句竟忽略了，而未記錄下來。在付印前也未予以補錄。這大約是當時作記錄的人，只用了速記的方法，因為那時現代錄音的設備尚未曾發明，自不免有這些不完備的地方。我在民國十三年是親聆

國父演講三民主義十六講的人，從第一講到第十六講，我從頭到尾都親自參加，注意恭聽，並曾作過筆記，可惜這批筆記，皆因大陸淪陷時，未即携出而散失！

目前印行的三民主義十六講，是由幾個速記員記錄，經過黃昌穀先生的整理，由鄭海濱先生等校閱，再呈國父加以核定付印。在大體方面，都表達得不錯，只是在若干關鍵的意義及生動有趣的地方，略嫌未能完全在記錄中表達出來。特別在民族主義第六講這一段的語句，雖然大體不差，却未能表達得十分生動而符合原來的精神，我願就我的記憶所及加以說明，使得更能易於了解其真意。因為民族主義的精義與重要，全在結論這一段。

國父在講詞中繼續說道：

「中國對世界究竟要負起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要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道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

「……比中國只有十分之一大的日本，在他強大之後，已威脅了亞洲，威脅了世界，如果比日本大十倍的中國強大起來，仍走帝國主義的道路，那末便會為中國帶來災難，而沒有好的結果，為甚麼呢？因為在此情形之下，我們將與世界為敵，世界各國將合以謀我，中國要陷於危險的地步。中國在沒有覺醒的時候，全世界人都說我們是『睡獅』，是『黃禍』，獅子一旦醒了，便要吃人的！一旦我們強大起來，他們那能放過我們？」

我這段的追憶，在各種三民主義的版本中，雖然已大體有啓示，但都沒有明顯的把他在記錄上完全表達出來。國父說到此地的時候，特利喚起大家重視，一再的說「你們大家要注意！要注意！」就是指的我上面所補述的地方。

國父繼續說：

「……所以我們應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助他，對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都立定了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的時候，想到我們今日受過列強的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

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要受這種痛苦的話，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我們要將來治國平天下，便要先恢復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地位。用固有的道德與愛好和平做基礎，去改變世界，成爲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

總統蔣先生對於中日之戰的最大貢獻，不只是領導此一戰爭所獲得的勝利，而是於勝利之後化敵爲友的「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的政策。

八、現代國家新國力的新觀念

狹義的國防力量，是指爲戰爭而準備的軍備而言，廣義的國防力量，是指整個國家力量，或「國力」而言。沒有充足的「國力」，便不會產生健全的國防力量。國際的戰爭或競爭都是國家力量的比較，而不在軍事上作對比。那末國家力量又從何產生呢？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抗戰正進入堅苦階段的時候，蔣廷黻先生曾發表過一篇「論國力的元素」一文，他說：

「此次的抗戰經驗及近月來世界局勢的發展，無不使我們覺得當前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國家的力量。此後無論我們是規劃政治制度、學校課程、交通建設、經濟發展，或是文化指導、禮俗釐定，甚至於私人的戀愛、娛樂諸問題的解決，我們都應該以國力爲我們最高的標準。倘若道德與國力相衝突，我們應該即刻修改我們的道德觀念。假使某種最大的國粹阻礙我們國力的發展，我們也應該火速割愛，把那國粹拋棄毀滅。我們希望我們心目中的『新經濟』就是『國力學』。」

上面的話，已足夠說明國力的重要，可是甚麼是國力呢？據廷黻先生在民國二十七年另一篇「青年的力量」文中說：

「國力就是一般人民的體力、智力、道德力、生產力、組織力集合而成的。一般人民之中又要以青年的力量爲其主力。倘若一個國家的青年是軟弱無力的，那個國家是無希望的；反過來說，假使一個國家有有力的青年，那個國家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國家的力量要從何產生？他的結論是現代化的教育。他舉出當時國人殷切希望的軍備現代化爲例，他說：

「目前國內沒有人不渴望軍備充分的現代化，不過現代化的戰爭，不僅是軍隊與軍隊的戰爭，實是全民的戰爭。有了現代化

的軍隊而沒有現代化的工業、交通和政治，還是不濟事的。要想政治、經濟的現代化，又不能不有現代化的教育。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說：一個國家，其政治、經濟、教育不是現代化的，根本不能有現代化的軍備。」

他又說：

「所謂近代文化的特徵是科學。工程和機械都是科學的實用。我們所提倡的現代化，就是科學知識、科學技能、科學思想方法之普遍化。」

要求科學知識、科學技能、科學思想和方法的普遍化，便非發揮教育的功能不可。因此，國家的力量是建築在國家教育的基礎上，這是現代教育的一種新思潮，亦是一種新觀念。這一教育新觀念，在四十多年前廷黻先生執筆爲文時，尙未爲人所重視，但他却已燭見及此。

在廷黻先生上述二文發表之後約二十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哈比孫先生（Frederick Harbison）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工業關係教授梅耶斯先生（Charles A. Myers）兩人合寫了一本名「教育，人力資源與經濟成長」（*Education Manpower And Economic Growth*）的書。在書中特別對於國力的產生和國力的衡量不僅提出了很新的見解，而且比廷黻先生在此書出版二十多年前的意見說得更爲具體而明顯。我在上面所提出的第二次中日戰爭，中國所持的抵抗強大的日本侵略的力量，是民族文化潛力的最高發揮，而不是與日本現代國防力量對比。我們是被迫奮起不得已而應戰的消極辦法，並不適應於一個近代國家爲了生存應具的現代國力而言。

關於現代國家國力的產生和衡量，哈、梅兩教授在其書中曾有精闢的見解，我在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曾有文研究，哈、梅兩氏的主張，大意是說：衡量一個國家國力的強弱和大小，從前是以下列各項條件來決定：

（一）軍備的龐大與否？

（二）資源的豐富與否？

（三）工業化程度的高低。

四人口的多少。

經過此書的著者哈、梅二氏研究的結果，認為以上所持的論點與說法都不完全正確。他們認為今日衡量一個近代國力的大、小、強、弱，是決定於用科學方法歸納出來的一個新觀念，名之為「教育綜合指數」。

甚麼是「教育綜合指數」呢？他們提出了一項簡單的計算公式，即是一個國家的十五歲到十九歲的人口中的在學人數百分比，（中學到大學一、二年級的在學人數）加上其二十歲到二十四歲人口中的在學人數百分比（大學到研究所的在學人數）乘五所得之總和。舉個例來說：他們利用了我們多年前的資料，認為我國十五歲到十九歲人口中之在學人數是百分之三十點九，加二十到二十四歲人口中之在學人數是百分之三點五乘五，其綜合指數如下式：

$$30.9 + 3.5 \times 5 = 48.4$$

乘五之原因，意指一個大學畢業者之能力，相當於未受大學教育者之五倍。由這一點可以推論到所謂教育綜合指數是包涵一個國家高深教育的深度和國民基本教育水準的普遍提高來決定的。所以各國的義務教育已由早期的四年、六年，進到九年的初中程度，以至十二年的高中修完為強迫教育的基礎了。一個國家的強弱、進步與落後，要在這一基礎上高低才能見分曉，這是值得我們警惕而應急起直追的。

照哈、梅二氏一九六四年的計算，我國的教育綜合指數為48.4，列世界的第二十八位。美國為261.3，比利時為123.6，日本為111.4，蘇俄為92.9。我國的教育綜合指數名列第二十八，雖然不算低，但哈、梅二氏所指係十五到十九歲人口中之在學人數為起算點，這很顯然的是以九年的義務教育為一起碼的計算標準，亦即是以初中修完為一起碼標準。並沒有計及我國之義務教育當時僅由六歲到十二歲的兒童，至少尚差了三年之時間乃能及於十五歲初中程度的普通標準。過去我國六年的國民基本教育，實不足以適應世界進步之趨勢。因此，把基本教育增進至九年初中階段至為必要。否則，以十二歲方完成國校教育之兒童，如欲作童工則需至十四歲，如欲作學徒則需至十五歲；如以之作一技工則年齡與教育程度均更感不足了。工業社會之基礎在技工階層，以年齡學識都不合格的兒童充塞之，不僅摧殘了兒童的身心，且亦將摧殘我們未來經濟建設的發展。民國五十一年（一九

六二）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專家應邀來我國研究教育配合經濟發展計畫，即認為我國技工水準太低，應予提高。五十二年美國勞工部副助理部長魏斯應聘來我國考查人力資源，亦認為台灣迫切需要確立一項人力資源的發展計畫，才能適應今後經濟建設的發展。又如民國五十三年，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經濟專家艾德爾曼與國際勞工組織專家唐琦應邀來我國研究經濟發展中的人力問題後，當時均認今日台灣經濟之更進一步的發展，有賴於人力資源之緊密與有效的配合。所以如不力謀國民基本教育水準之提高，今後經濟建設的發展，必將因之而停滯不前。

從以上的觀點，我們可以回想到在甲午年（光緒二十年、一八九五）第一次中日戰爭，中國所以戰敗的原因所在。因為日本遠在甲午之戰以前二十六年，即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明治維新便即着手預備從事國民強迫教育，走向國家現代化的途徑，而我們中國一直到了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後，才廢科舉、興學校，對國家現代化方開始覺醒，與日本比，竟落後約三十七年之多。如果我們以「教育綜合指數」來衡量我們當時的國力，我們所以失敗，當然是有其原因所在的。即以第二次中日戰爭情形而論，我們的「教育綜合指數」雖較甲午之戰時為高，但仍然不及日本遠甚，則是一種事實。

自大陸淪陷，政府播遷來台，總統蔣先生最明智一項決策，便是把國民基本教育由六年提升到九年。這不僅是普遍的提高了國家人力資源的素質，促進了國家的繁榮進步，而且軍隊素質的提高，更非一、二兩次中日戰爭時的情形可以比擬的了。加以兵役制度的建立與軍隊的現代化，我們現在的國力，真可說是空前的強大。

我曾說：文化是一個民族不可征服的力量，而文化的形成的關鍵則在教育，也即是今日衡量國力強弱的「教育綜合指數」。檢討戰爭的得失，這是一個可採的新觀點，更是可資借鑑和不可移易的一項原理。

九、現代戰爭與人類前途

戰爭是人類歷史遺留下來的是一件悲慘殘酷的史實。從理性上講，沒有人希望戰爭，更不應有人願意戰爭，然而戰爭終不可避免者却是一項至今存在的事實。其原因何在？則為極富研究探討的一個問題。在若干年前，我曾發現大科學家愛迪生（Edison

1847—1931)一項記載，他好像說：戰爭是人類歷史上的大災難，勿論是戰勝與戰敗的兩造，都不會盡蒙其利。然而戰爭的慘禍，終於不能免者，實爲人類一項愚昧的行爲。因此，他以科學家的觀點，認爲人類要免於戰爭的災難，只有待至有一天人類能夠發展原子偉大力量的時候，戰爭或可避免吧！因爲在這一情勢之下，戰爭將是人類的毀滅，因此人類便不敢從事戰爭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初度使用原子彈於日本廣島、長崎，促使了日本的投降，而結束了對日的戰爭，可以說在科學家的觀點得到了一項明證。却是自二次大戰以後，原子彈、氫彈、鈷彈、中子彈的發展，其威力之大，已大大不可與投到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等量齊觀，各國現時儲存的原子武器已足夠把地球上生存的人類毀滅淨盡，而今日人類面臨的嚴重問題，能否免於核子戰爭帶來的毀滅呢？

我們對日八年艱苦的抗戰，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史中，一項最輝煌的戰史，其發生可以說得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而他的結束，亦是由於人類初次使用原子武器而投到日本的廣島、長崎，從傳統武器的戰爭，進入到了核子武器的時代的開始。因此，我們研討中國對日抗戰史，便不能忽略了此一突破的事實。因爲原子彈的使用，已經構成了一項歷史的事實，並不是完全屬於今後我們才將面對的，而未發生發展的情勢。歷史的作用不僅是單純的就往鑑今，更是要鑑往以知未來。所謂「歷史不會重演」的這句名言，其中包涵了構成人類歷史的諸多因素：如人才的興衰，環境的變易，鄰國的突起，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變動，科技的進步等意義在內，「歷史不會重演」所指的應當是這些發展的因素不斷的在增加，不斷的在變動，因此便無從固定一格，依樣而永久不變。雖然如此，在歷史家最要緊的任務，是要在這一變動中的歷史發展因素中尋找出若干共通的理則軌轍，取精用宏來「鑑往知來」，以應付目前或未來我們將面對的問題。

戰爭進步發展到了核子時代，固然是毀滅性的，是最可怕的；但是這些危機都是由人類的智慧和努力發展出來的，人類可以發展出毀滅自己的核子武器，人類同樣應當用我們的智慧來制止，或打破核子時代的危機以自救。我常說：科學是人類研究發展出來的，却是今天的科學發展如果用於戰爭的話，已足夠毀滅人類自己了，而人類要如何才能管制這一大的毀滅性的力量不會亂用，而用在人類的福祉上，亦應當是人類智慧所能做得到的。

以往戰爭的本質，本來就不限於戰鬥與武器，因此要應付原子時代帶來人類毀滅性的危機，自當在人類智慧、理性和樹立新道德觀念中以求之。近代文明的特點是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亦即是自然科學、物質科學的高度發展，而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則日趨式微和停滯。這一弊害長此發展下去不加補救，人類的前途真是不堪設想了！

戰爭是達到國家目的的一種手段，而達到國家目的的途徑，應不完全限於戰爭。有些戰爭應當是可以避免的，而終於不能避免，造成兩敗俱傷的後果，中國和日本之戰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老子有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中日第二次戰爭的結果，正可為這一名言作一個注腳。日本於戰敗之後，很快獲得復興，其繁榮進步幾超越於戰前。中國於取得勝利之後，反而為國際共黨所乘，致使大陸淪陷，八億以上之同胞，困頓呻吟於共黨暴政之下，而急迫待救。更為奇突的一件事，則為：在甲午（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兩國發生第一次戰爭，中國戰敗，於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春締結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於日本。迄第二次中日戰爭日本戰敗，於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投降，中國於距此五十年前割讓於日本之台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且屹然矗立成為萬丈光芒保衛自由之燈塔，奠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想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凡此皆非戰爭之初所料及者矣！

戰爭本為達到國家之目標而起，歷史上之戰爭，其能達到真正國家之目標者幾何？戰爭之目的應在和平，而何種戰爭曾奠和平之基礎於永固？人類無不厭惡戰爭，而戰爭則永未抹去其在歷史上之存在，至今仍為一可懼而待決之問題。今日人類已進入於毀滅的原子戰爭之時代，其將何所措手足乎？

智慧之發揮乎？以智慧循歷史舊的軌軌，而投入於更大更殘酷之戰爭乎？抑以更大之智慧而免於戰爭，以挽救人類之毀滅厄運乎？人類前途的禍福，實有待於今日人類的抉擇！

執筆至此，國際電訊傳來埃及（Egypt）總統沙達特（Sadat）訪問以色列（Israel）的新聞報導，當沙達特抵達機場時，以最熱烈的笑容與以色列領袖們握手，其祥和之氣令人深為感動。衡諸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民族的累世深仇而竟有此一大轉變，其間所蘊藏之波瀾雖尚未易測，然不失為二次大戰以來，中國對日施行以德報怨政策之後又一歷史性的突破！

今日人類應有之抉擇為何？在我看來：

一是人類大智慧大政略的發揮，以更進步的科學成果，尅制以往科學爲人類帶來的毀滅的威脅。
一是建立新的道德指標，化戾氣爲祥和，以促進人類的和諧共存而進入大同。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廿日於國史館



國史館藏書



0123832

28.5
427-2

國史館

A. Denis + Associés